

朝鮮支那人的經濟勢力

小田內通敏原著 祖運輝譯*

譯序

對於中國人海外移民（華僑、華人）的研究在歷史、社會、經濟、文化各方面，中外學者已經取得大量的成果，在這裡不用贅言¹。從地理上來說，北美和東南亞的中國人移民社會比較受到學者的重視，研究的數量和水平也比較高。關於日本的中國人移民社會的研究在二次大戰前已經稍有累積，其中以日本人的著作為主，不過在質量兩方面還是要等到戰後，特別是近十年才開始蓬勃起來²。相對於日本，有關韓國的中國移民的研究可以說是鳳毛麟角。年前譯者與同事有意組織一個會議，比較日韓兩國中國人移民的歷史與現狀，雖然日本方面的學者名單很快就能決定，經過多方打聽，我們還是沒有辦法物色到合適的韓國研究者，結果只好暫時打消開會的主意。當然，這也有可能是譯者個人資訊和學問有限的結果。無論如何，根據日本福崎久一編的《華人、華僑關係文獻目錄》（1996），有關韓國中國移民的著作實在非常少，有的話通常還是非學術性的短文。戰前韓國屬於日本，可是比較他們對東南亞中國移民的關心，日本人對韓國的中國人沒有特別積極的進行研究：朝鮮總督府出版的《朝鮮の支那人》³（1924）和這裡介紹的小田內通敏的著作（1925）可以說是少數的例外。譯者希望本文的出版能夠對廣大研究中國移民的學者提供一些比較受到忽略的參考資料。^{**}

* 譯者祖運輝先生，新加坡國立大學日本研究系助教授。

** 《韓國華僑志》節錄與引用小田內的著作和朝鮮總督府的報告。

¹ 見福崎久一編（1996）。

² 見飯島涉編（1999）。

³ 譯者準備短期內着手翻譯此書。

中國人移民韓國是屬於中國人向內蒙古、東北以及西伯利亞移居潮流的一個支派。如小田內所說，它的歷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明代，不過在十九、二十世紀，這個現象必須放在俄國和日本在東北亞的勢力擴張的脈絡裡來理解。1903年錢恂的夫人錢單士厘乘搭日本郵船經過釜山到海參威，她的日記提供我們一些線索，可以推測當時的移民情狀。

（陽曆）4月20日：午前八時抵朝鮮之釜山港（、、、）此地有華商百余，皆山東人，零星小販而已，中國設一領事官。

4月28日：此船載中國人五百以至六百。聞每歲陽四月後半始，山東人陸續往海參威者三四萬人不等。此等人初非盡留威埠，蓋散佈俄境、滿境，以勞動為生者也⁴。

由此可見，小田內的研究雖然只是一本小冊子，它卻涉及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值得我們重視。

比較總督府的報告書（203頁），小田內的研究（67頁）要來得簡短的多：它的調查材料相對的粗略，尤其是統計資料沒有前者的完整。可是它也有可取之處：作為一個個人研究者，小田內不但能夠為讀者提供他個人的觀察結果，也能夠比較自由的對各種現象發表自己的意見和感想。在整體構想上，他的研究的主要特色是強調商人、勞動者和菜農這三類移民的重要性。相對之下，總督府的報告書雖然資料豐富、範圍廣泛，卻缺乏一個鮮明的焦點，對讀者來講不單止內容枯燥，也不容易抓住重點。因此，我們可以說小田內的著作與總督府的報告有一種互補關係；官方的出版品長於資料，小田內則提供一個鮮明的個人觀點。為了充分理解中國移民在日本統治下的韓國的歷史，我們除了需要注意官方發表的社會經濟資料以外，還要照顧到屬於統治階級的一般日本人對中國移民的主觀態度。換言之，小田內的研究正是因為充滿了個人的印象和價值判斷，所以它能夠幫助我們了解日本帝國主意的意識形態，尤其是日本人如何從自己的利益立場出發，把韓國人和中國人定位。

⁴ 楊堅校點（1981:41,44）。

另一方面，因為小田內是在本國的帝國主義膨脹的前題下試圖分析中國移民的特徵，他的觀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一般日本人對殖民地的韓國和半殖民地化的中國的人民的觀點。比方說，作者對韓國人的蔑視通篇可見，批評他們懶惰、不團結、不耐勞、體力衰弱、沒有經濟頭腦，好像他們的國家淪為日本的殖民地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對於中國人，作者表面上似乎頗為欣賞，稱讚他們的勤勞、樸素、團結等美德，甚至批評日本人在這些方面比不上中國人。不過，我們不要忘記作者眼裡的中國人雖然團結卻沒有國家觀念，雖然節儉卻終日為蠅頭小利而奔走，雖然勤奮卻沒有科學方法，只會墨守成規。換言之，他們雖然比韓國人要強，比起愛國、文明、經濟發達、科技進步的日本人，他們不過是賣力氣，頂多也不過是做小買賣的人。其實這種看法並不限於小田內一個人，而是在戰前和戰爭中的日本相當普遍的⁵。因此，小田內的著作不僅幫助我們了解在日本統治下的朝鮮的中國人，也增加我們對帝國主義時期的日本的人種、文化和殖民地思想的認識⁶。

其實，小田內對韓國的中國人的研究基本上是反映了日本人對日本本土的中國人的關心。小田內認為中國商人和勞動者不單止是韓國人的對手也是日本人的勁敵的看法在日本國內很普遍。最晚在 1880 年代，無論是日本政府或者是人民已經對在日本謀生的中國人存有戒心，處處提防，又設法限制他們的活動。^{*}日本的一些有識之士早就指出中國商人實際上控制了日本的大部分對外貿易，日本人有必要從他們手中奪回商權。到了 1899 年，明治政府趕在“外國人居留地”和所謂的“雜居地”被取消以前，特別立法禁止中國人在舊居留地和雜居地以外的地區勞動謀生。1923 年，也就是小田內的研究出版的前兩年，日本內務省警保局外事課完成了一份《支那人勞動者取締狀況》⁸的機密文件，簡單的介紹中國人勞動者在日本的情況和他們所造成的問題。由此可見，小田內的研

* 見籠谷直人（2000:9-13）。

⁵ 見 Tsu (1996)。

⁶ 見小熊英二（1997）；淺田喬二（1985）；Tanaka (1993)。

⁷ 警保局外事課（1923）。

究並不是一個孤立於殖民地的現象，而是承繼了日本人對於本國的中國人的經濟和社會力量所抱的戒心。

本書作者小田內的生平不詳，書裡也沒有介紹。本書由東洋研究會出版，屬於東洋講座第七輯，可是出版地和日期都不明。根據作者的前言，我們把出版日期暫定在1925年。至於東洋研究會的性質，書裡也沒有交代。書後所列的同仁名單包括以下的人：小田內通敏，大川周明，內田寬一，山口察常，安岡正篤，松井等，古城貞吉，佐久節，宮原民平，滿川龜太郎，善生永助。看來這似乎是一個小型的研究會，雖然會員中也包括了像大川周明和安岡正篤那樣有名知識份子。

最後需要一提的是兩個翻譯上的問題。第一，在翻譯過程中，譯者的重點是傳達原著裡的意思和事實，至於作者的一些語法和詞鋒，因為日語和中文的差別，加上譯者能力有限，只好做彈性的處理，希望讀者諒解。第二，譯文沿用原著裡的“支那人”和“朝鮮人”是有特別用意的。其實，最簡單的做法應該是把“支那人”翻成中國人，“朝鮮人”翻成韓國人。不過，因為這兩個名詞在十九、二十世紀的日語裡的用法帶有貶義（戰後部分日本學者堅持繼續使用“支那人”，辯稱他們的用法是中性的），為了保留原著裡的帝國主義和殖民地色彩，譯者決定沿用這兩種有歧視性的名詞。同時，譯文也保留“內地人”的用法，因為它的意義是相對於“朝鮮人”的。也就是說，殖民地宗主國日本是“內地”，而它的殖民地如“朝鮮”，南洋群島和台灣則是“外地”。

在翻譯過程中，譯者得到多位人仕的指教和幫助，特別在此致謝：新加坡國立大學的同事大北葉子博士，町田宗鳳博士和郭俊海老師幫忙解讀日文，京都大學的田中雅一教授邀請我到人文科學研究所訪問，同所的籠谷直人教授提供寶貴資料，神戶大學的過放博士提供利用大學圖書館和影印服務的方便，民族所的兩位匿名審察人給予詳細的批評。當然，譯文中的一切錯誤都歸譯者個人負責。

翻譯所使用的原書藏於神戶大學經濟學圖書館。原書裡的照片、繪圖和部分圖表因為不好複製，只好從略，請讀者諒解。

原 序

本人數年來有機會觀察到朝鮮各地的種種生活樣貌，其中最感到驚訝的是散佈在朝鮮各地的支那人的經濟活動，無論是商人、菜農、還是勞動者。正如在釜山港我們到處看到的都是身穿白衣的朝鮮人，一旦渡過鴨綠江我們的周圍卻變成藍衣的支那群眾，在經濟方面，朝鮮人和支那人的分別也有如白色和藍色那麼不一樣。如此，在朝鮮的支那人的確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而且，在一切問題都國際化的今天，這些支那人的行動不只是相對於朝鮮人，就是作為我國全國性的問題⁸，也是同樣具有研究價值的。

本人從朝鮮到奉天和大連的旅途中，以及從天津到北京的路上，目睹支那人在故鄉過著簡單的生活而又保持經濟獨立的那種雄姿，就更加相信他們作為他山之石，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此即本人將拙著公之於世之所以。

大正十四年（1925）六月末日

小田內通敏

⁸ 譯注：自 1910 年日本與韓國“合併”以來，日本人把韓國的政治當作內政，而韓國人民在理論上也變成日本帝國的臣民。見山邊健太郎（1971）。

導 言

支那人的世界性移居與其理由

作為一種經濟潮流，支那人口從故鄉流出國外，經由陸路和海路擴散到世界各地的民族發展過程，的確是一個世界性的奇異現象。可是，雖然有關白種人的世界性擴張已經有了科學性研究的發表，關於黃種人的世界性擴張卻只有充滿偏見的研究⁹。支那人本身對於這個問題也缺少研究，原因之一是傳統的讀書人不把這種問題當作研究課題，另外一個原因是移民者本身缺乏研究的能力¹⁰。今日支那人的分佈達到世界各地：與他們國土接壤的亞洲大陸各國——自北方的西伯利亞到南方的法屬印度支那、暹羅、海峽殖民地、緬甸和印度；經南洋群島到澳洲；在太平洋對岸從北美到南美；以及達到印度洋西岸遙遠的南非。這些移民雖然可以分為知識份子，商人和勞動者三個階級，在人數上，勞動者佔總數的百分之八十五¹¹。他們的總數因為經常變化，所以不容易得出一個精確的數字；根據 MacNair 的估計大概在八百到九百萬之間¹²。這樣大量的人口在移居外國的時候，他們跟歐洲各國的移民不一樣，並沒有得到任何政治上的優待，也沒有受到本國的保護。可是，移民歷年大量流出，原因在於他們的社會有很發達的幫會組織——即同鄉會或同業會——這種組織在社會和經濟上都是一股強大的勢力。支那人的國家不過是形式上存在而已，是幫會在支持他們的社會，保障它的生存，並且發揮了經濟上的功能¹³。支那人的世界性移民並非政治移民，而是經濟移民。這種移民，尤其是勞動者的國外移居的主要原因是國內人口過剩，農村人口的流出，清朝政府的惡政與社會對勞動階級的壓迫。在國際

⁹ H.F. MacNair, Chinese Emigration. 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April 1923.

¹⁰ 北京大學教授陳啟修著《新支那》。

¹¹ 小山清次著《支那勞動者研究》。

¹² H.F. MacNair, Chinese Immigration. 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April 1923.

¹³ 木村增太郎著《支那的財政和階級》。

方面，主要原因是他們彌補了世界性的勞動人口短缺，特別是歐戰所引起的嚴重勞動力不足¹⁴。支那人移居這些也是這個世界大趨勢的一端。

朝鮮支那人的經濟職能

今日旅行朝鮮的人，從京城和仁川開始，無論是往北到新義州、平壤、鎮南浦、元山、清津，或是往南到大邱、釜山等主要城市，都會看到支那人在商業、種菜和勞動方面極為活躍。可是，到朝鮮內地旅行的人都會發現支那人不只是活躍在大城市，就是在郡、廳所在的所謂“邑內”地方，也必定有十多戶，至少也有三、四戶支那商人在經營雜貨店或食肆。他們以這些地方城鎮為根據地，像水往低處流那樣，背著布類和其他商品到遙遠部落的市場去販賣，或是在山邊以及路旁的小民房經營麵鋪¹⁵。本人在進行部落調查的路上目睹這個現象，領會到支那人對朝鮮經濟的侵入，無論是對於朝鮮人還是對於內地人，都是一個不可掉以輕心的勢力。據本人所見，從來對支那人的調查除了數字資料以外，沒有任何完整的研究。這就是本研究嘗試說明支那人在朝鮮的經濟功能的原因。

一、移居的過程

開港後支那人的移居

支那人移居朝鮮半島的歷史在文獻上有漢代的樂浪、臨屯、玄菟、真番四郡設置的紀錄。不過，我們的目的是認識現代的生活，所以只需要追溯現今居住在朝鮮的支那人的移居過程。在韓國時代，外國人是絕對禁止入境的，只有支那人能夠在鴨綠江岸一里以內從事農業，自由往返；此外，在圖們江岸的會寧、慶源兩地有所謂的“清市”。可是，清市一年只有一次，只有那時候商人

¹⁴ 小山清次著《支那勞動者研究》。

¹⁵ 譯註：原文是“支那蕎麥麵鋪”。按照戰前用法，這是麵鋪的通稱，並非專買蕎麥麵的店鋪。

才會聚集在這兩個地方。試述會寧歲市的情形如下。除了咸鏡北道產的麻布、大口魚、麝香、熊膽、甘草、北黃紙以外，各郡適當的分配繳納牛三百三十三頭、鹽三百八十石、梨三百八十個，經會寧府收集，再由府使等候每年舊曆十二月二十日清朝官員到來，將貨物交付。來訪的清朝官員一共五名，隨員兩百多人，此外還加上商人。屆時會寧府使會到北門外迎接；而供一行下榻的別館有房間七十多間。市場設在通往南門樓的街上，清朝官員把接收到的貨物在此販賣，與此同時，從二十日開始連續二十天“開市”，讓兩國人民通商。這個時候，兩國商人從各地趕來，市況極為興盛。清市的制度維持了兩百五十年，一直到四十四年前，即明治十五年（1882）才因被禁而中止。當然，在清市正式設立以前，清韓兩國人民已經私下有貿易，在設立以後交易規模更加擴大。如此，近年支那人往朝鮮的移民應該是以各通商港口的“開港”為出發點：即是以明治九年（1876）二月，日韓兩國在江華府締結“日韓修交條約”後，在京畿、忠清、全羅、慶尙、咸鏡五道沿海地區，為方便貿易而開港的釜山和元山為嚆矢。回顧各港口開港年份如下：

釜山	明治九年（1876）
元山	同十三年（1880）
仁川	同十六年（1883）
木浦	同三十年（1897）
鎮南浦	同三十年（1897）
群山	同三十二年（1899）
城津	同三十二年（1899）
龍岩浦	同三十九年（1905）
清津	同四十一年（1908）
新義州	同四十三年（1910）

試以今日支那人口最多的仁川為例，考察他們的移居過程。根據開港後八年，

即明治二十四年（1891）出版的信夫淳平著的《韓半島》，「仁川的貿易大體來說輸出權在我國人（日本人）手裡，輸入權則在清商的掌握中」。信夫又列舉支那商人比日本商人優越的理由加以詳細說明。仁川與山東半島因為地理上靠近的關係，從早期就是支那商人的根據地，後來則有跟隨商人而來的農業移民。今天，仁川府蔬菜栽培業的主要人物王承謙是二十多年前才來到朝鮮的。由此可見移民的過程：在商人和勞動者的集體移民之後，跟隨而來的是供應他們蔬菜的農民。

支那人的經濟使命

支那人移民逐年增加的情況是怎樣的呢？很可惜，明治初年的資料無法找到。如附表所示（從略），從明治四十四年（1911）到大正十一年（1922）之間，支那人口增加一萬九千人，增幅約有兩倍之多。

	支那人職業比率 (大正十一年末)	內地人職業比率 (大正十一年末)
商業、交通業	51.8%	30.6%
農、畜牧、林業	17.2%	10.5%
工、礦業	11.0%	16.3%
公務、自由業	1.9%	34.5%
魚、鹽業	0.1%	-----
其他職業	15.3%	4.8%
無職業、未申報者	2.7%	0.1%
共計	100%	100%

支那人的總數是三萬一千，只有內地人的十二分之一。不過，從性質上來看，他們一半以上是商人，然後是從事農業和工業，由此可見他們的職能完全屬於經濟活動方面。內地人則相反，以公務員和自由業者為最多，從事商、工、

農業者次之，兩國人之間有顯著的差異。不過，支那人與內地人的差異不單止是職業比率的問題，支那人赤手空拳、逐步發展的經濟活動樣式，也是他們跟內地人明顯不同的地方，這是內地人和朝鮮人必須謹記的一點。由朝鮮人經營的《東亞日報》就以“中國人的特長”為題，說明他們的勤儉和勞動所提供的教訓如下（摘要）：

1. 支那人的國家雖然脆弱，他們的社會卻是堅強的。其中原因何在？我們不能不承認，與其說是因為他們固有文化的關係，倒不如歸因於他們的勤儉勞動更加適合。
2. 因為勤儉勞動的關係，雖然是在喪失政治主權的時候，他們還是可以繼續享有經濟上的實利；也就是說，他們的國家就是滅亡，他們的社會還是能夠繼續存在。如果他們像朝鮮人一樣，不但斷送了政治主權，連經濟的實利也一併讓與他人，則國家的沉淪必定引起社會的破滅，今天又怎麼會還有中國人的存在呢？因此，政治沉淪的國家還有復興的機會，而經濟上受到破壞的社會卻沒有復甦的餘地。其實，國家政治的實質是建立於社會經濟上，只要社會存在，如猶太人一樣，國家雖然滅亡幾千年，還是有復興的機會。可是，如果社會遭受破壞，國家又怎麼能夠建立在空虛的基礎上呢？這種絕對不可能的事情是不說自明的。其實，那是因為人民的勤儉勞動鞏固了社會經濟的基礎。勤儉勞動實在是中國人的偉大之處。
3. 朝鮮人向中國人學習已經有數千年，卻忽略了其文明精髓所在的實利主義。雖然兩國同樣奉行以務實力行為信條的儒教，它在中國是以子貢的重商主義出現，增加社會的財富與力量。反之，儒教在朝鮮是以顏淵的清貧主義出現，實現在社會生活裡，結果今天的朝鮮民族普遍乞丐化，陷入飢餓的悲慘局面。耽於清貧實在是可怕；雖然目睹經濟破產、社會解體、人民散亡的大悲劇，還能夠在斗室孤燈之下，悠然向他人自誇清貧的做法，確是一種無法用語言形容的麻木態度。可是，人是會因應環境而改變的。眼下的形勢迫切，我們應該拋棄長久以來所奉行的清貧主

義，轉而遵行實利主義。現在是朝鮮人各自改變傳統的錯誤思想，把切實的生存欲望體現於社會的最後關頭。

4. 如此，衣食的問題是所有朝鮮人，無論是民族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宗教家還是藝術家都必須緊急解決的先決問題。因此，每個人都必須成為生產性的勞動者以供糊口，同時把整個社會生產勞動化，從而勉強延續它的生命。這個模範不需要到遠方文明國家的人民（歐洲的文明國民）那裡去尋找，近處的中國就有不少可取的地方。讓我們正視這些中國人，他們為了蠅頭薄利而忍受一般人所不能忍受的辛苦，汗背垢臉的體現了他們的社會之所以能夠保持健強的最大原因。他們赤手空拳、以勞力作為僅有的資本縱橫天下，比起那些文明國家的著名藝術家和科學家，他們給朝鮮人提供了更有意義的活教訓。嗚呼，朝鮮人要認真學習的是社會性堅強的中國人的勤儉勞動。

支那人經濟上的優越性不單是朝鮮人的活教訓。通過本文，本人希望敘述支那人移民的主力，即是商人，蔬菜栽培業者和勞動者的特徵，以加深對他們的認識。

二、商人

支那商人，包括交通業者在內，一共將近有一萬六千人，佔支那移民人口總數一半以上。從下表的數字可見這些商人所聚居的地方是最早允許外國人居住的貿易港和各道的主要城市。

主要城市的支那人口（大正 11 年（1922））

京城	3407
新義州	2958
仁川	1786
平壤	698

清津	586
元山	567
鎮南浦	539
大邱	480
兼二浦	316
龍岩浦	299
會寧	174
釜山	257
義州	245

支那商人是如何在主要都市經商，進而在地方城鎮以至市集發展呢？本人先略述其特徵，再以模範都市為例加以說明。

支那商人優越的主要原因

支那商人優越的主要原因在於他們資本豐厚、尊重契約、而且金融機構發達，大多數的商店都是合資性的組織。主要的布店和雜貨店都是由二到五人合伙經營，股東一般都留在本國，在朝鮮的店舖則由經理和店員組成，大的商店可以擁有店員三到四十人。店員有些是由股東推薦，但是一般來說僱用權屬於經理的權限，由他直接從本國招募。普通店員並不分享商店的盈利，不過他們可以根據業績得到小量的獎金或是回鄉探親的獎勵。這些商店的交易對象主要是朝鮮人。至於金融機構方面，他們採用根據信用的委託販賣，和在買賣成立以後才運送貨品的方法，即使是從香港和上海輸入貨物，他們也要等到每年的兩三次結帳時期，才以現款付賬；所以，就算是遇到一時的經濟不景氣，他們也不會因為利息高漲而陷入困境。如此，他們的經商原則是以低價入貨，再以低價銷售，從而確保長期的利潤。這種經營方式並不限於大都市的商店，在地方各處行商的商人也採用同樣的方式。比方說，在朝鮮各地稱為邑內的地方中心，如京畿道的開城、黃海道的遂安和沙里院、忠淸道的禮山、江景和安城等

地，都有不少支那人居住並且擁有房地產。他們以這些地方為中心，派出大量的零售者到各處行商。這些人之間有一種自治組織，使中心和地方保持聯絡。內地人行商者的做法則完全不一樣，他們每一次把隨身攜帶的少量貨物賣完以後，都必須回到中心的大都市添購貨品，再次出發¹⁶。

支那商人的發生過程

支那商人經營的特徵已經略述如上，關於他們的發生過程也有必要一提。無論是在地方行商或者是在大都市開設店舖，他們在創業的時候，一定會在商業資金以外預先保留部分資產。在這方面他們與內地人不一樣，因為這樣他們縱然遇到商業不振，生活也不至於陷入窮境。他們的顯著發展證明了他們的優越性：很多時候，他們起初只是在街市的一角，從一間狹小的店面販賣麵包、棉布、化妝品、日用雜貨、食品，不過很快的他們的店舖就會改裝成支那式。又或者是行商的人，起初只是販賣一些廉價的麵包和粗糙的朝鮮食品，其間經過不斷努力開拓與各地的交易，短期內便能夠在地方性行商中心地的邑內開設店舖，作為經營的根據地。比較內地人和朝鮮人，他們的做法來得既踏實又有穩固的基礎。

模範地區新義州

經過本人實地調查的京城、新義州、仁川、平壤、鎮南浦和元山的部分地區，從房屋的結構來看會讓人有支那商業區的感覺。例如新義州，正如名稱所示，是一處新市鎮。明治三十七、八年（1904－05）日俄戰爭之際，由於鋪設京義鐵路之需，在此地設立臨時鐵路部辦公室。於是，位於鴨綠江口左岸的此處沙地開始有少數內地人前來居住，是為市鎮的濫觴。此後陸續有郵局、稅關、政府辦事處和營林廠的設立，形成內地人的新市街，同時又有朝鮮人和支那人前來居住。新義州在地理上因為與滿洲一衣帶水，支那移民的人口僅次於京城，

¹⁶ 見信夫淳平著《韓半島》和朝鮮總督府編《朝鮮的支那人》總論。

佔全朝鮮的第二位。其總人口七萬九千人之中，朝鮮人佔九成，支那人與內地人各佔半成。本人以此地為支那商人居住的模範地區加以考察。

先說明支那人經營上的最大特徵，也就是他們的自治性行會制度與店員的培育方式。從明治四十年（1907）支那商人開始移居此地，到明治四十二年（1909）已經有一個由十多戶商店組成的公議會組織。成立當時只是得到清朝駐朝鮮領事的認可而已。後來改名商務總會，現在根據中華民國的商務總會令而改稱中華商會。新義州的內地人到今天依然沒有設立商業會議所，而支那商人之間能夠有這種自治行會組織的成立，證明他們在經商上是有團結力、自發性和組織性。今日，這個組織有會員一百二十四戶，商會的業務包括國民學校的經營、房屋與居民的調查、商業糾紛的調停與裁判、會員委託的財產整理、提供商業發展上的方便與計畫、辦理移居和生死事務、也處理救濟和傳達領事館的通告等。會費方面，會員分類從特等開始共有八等，特等會費十二元，第八等一元，每月徵收，八等以下的會員則適當的徵收會費。從大正四年（1915）起，商會開始調查當地與上海方面的商品供需情況，與此同時，在新義州以外的義州、楚山、江界和定州設立分會，最大的分會有會員四十四戶，最小的有八戶。由此可見他們的商業組織條理井然。新義州以外的各主要城市（京城、仁川、平壤、清津、元山、鎮南浦、釜山、群山、木浦等）也設有類似的商務總會。

在店員培育方面，他們大多數是從故鄉招募而來，十五、六歲以下的是見習生，也就是學生的意思，原則上不支薪水。一般當見習生的時間是三年，期間他們學習辭令、態度、商品鑑定、銷售和交易的處理等，累積各方面的實習經驗，同時學習朝鮮語和日語。達到支薪階段以後，從十六歲起月薪六元，到二十四、五歲時月薪十八元，除去必須的費用，剩下的薪水依照慣例存放在經理處。店員一般都是在店舖的一角共同起居，經理則與家人住在另外一個地方，因此商店在夜間是交給資深店員看管的。根據本人在新義州最大的雜貨店見聞所得，經理的住家距離店舖有兩三町，僱有店員三人協助經營，店員全操日語，即使是少量的定單，他們也會迅速送貨，而且價格便宜，所以連內地人的商店

也逐漸失去老顧客。

從商店的種類來說，以朝鮮人為主要交易對象的商店多販賣麻布和棉布，以內地人為對象的則以販賣雜貨和食品為主。不過，跟支那人生活最密切的三種商店要算是餐館（料理店），理髮店和茶館或飯館。餐館在支那人之外，也以內地人和朝鮮人為顧客，理髮店也以內地人和朝鮮人為對象，而且它們比內地人經營的理髮店服務周到，因此漸漸繁榮起來。茶館或飯館需要特別說明一下：一種是賣茶的地方，另外一種是賣麵包和其他簡單飲食的地方。在勞動者眾多的新義州，這種飲食店的生意特別好。支那人因為絕對不喝水，所以每天必定喝茶三次，在喝茶的同時又可以簡單用餐的飯館，對以儉樸生活為信條的支那人來說，是不可或缺的設施。就是內地人和朝鮮人勞動者也經常光顧這種地方。

本人以新義州為例，介紹了支那商人的活動情況。其實，在朝鮮各地的小城鎮，他們都以同樣的組織和經營方式取得很好的進展。

三、菜農

作為菜農的優越性

在朝鮮各地從事農業的支那人數不到四千五百人，比起商業和勞動人口要少的多。他們大多數定居在大都市的近郊，供給都市人口所需要的蔬菜，是勤奮的集約式農民。他們的經營狀態遠勝於朝鮮的農民，就連內地人也要輸給他們一籌。今日的朝鮮因為內地人移居各大都市，加上鐵路的開通和工商業的發達，導致人口向都市集中的傾向。與此同時，都市人口所需要的蔬菜量逐年增長。如此，支那的農民——也就是菜農——與朝鮮的主要都市的發達有著密切的關係。下表（從略）所呈現的是過去十三年支那農民的逐年人口變動。除了明治四十四年（1911）與大正三年（1914）是負增長以外，其他各年都有明顯的增加，大正十一年（1922）的人口差不多有明治四十四年的四點五倍。如此，我們可以推論朝鮮的支那人菜農人口，跟隨主要都市的發展，在十年、二

十年以後必定會增加到相當的數目。雖然沒有明確的統計數字，各道的大城市的近郊都有多數的定居農業經營者。京城和平壤等都市的近郊明顯的有此現象，仁川附近的情況就更加清楚。以下，本人將支那人菜農的特徵，就農業生產的各個組成要素來考察。

土地利用與農作物

首先看土地利用。以京畿道富川郡為例，每戶平均耕地面積甚小，比較全朝鮮一戶平均面積的一町六反¹⁷只有一半左右。

	調查戶數 戶	耕地總面積	一戶平均面積	一人平均面積
		町反	反畝	反畝
文鶴面	100	8.7	0.87	0.22
南洞面	5	1.5	0.31	0.37
多朱面	83	4.6	0.55	0.11

我們當然不能執此一端而推論支那人蔬菜栽培的整體情況。不過，根據這個資料我們還是可以做一些推論。實地調查的時候，本人發現有一個三人家庭，加上兩個僱工，耕作僅僅三反的土地來維持生活的例子。由此可見他們的農業經營方式是如何的集約；雖然我們必須考慮到支那人的生活標準是極低的。（見第五章：生活標準。）在這樣小塊的土地上，他們所種植的主要是供給內地人食用的各種蔬菜。耕作的方式是先把耕地畫分成區，然後按區栽種不同種類的蔬菜，由春天的蔬菜到夏天的、秋天的、然後是冬天的，順序輪流耕種。這樣的輪耕使得同一塊土地在一年中可以多次使用，結果有如耕種面積比較廣大的土地。因此，就耕地來說，他們為了充分利用有限的面積，所投入的勞動力與資本是非常大量的。實地調查時，本人目睹仁川附近的農民以軟化栽培法¹⁸種大

¹⁷ 譯註：一町有十反，相當約 99.18 are。

¹⁸ 譯註：即在幽暗處栽培以確保蔬菜幼嫩。

蔥。他們在自家臥房的部分堆起泥土進行軟化栽培，或者是培養甘薯的幼苗。他們又利用耕地旁邊彈丸之處種植豆角、豌豆和獨活等蔬菜。他們的栽培方式並非科學性的農業，只是按照先人傳下的經驗，加以改良而已——這是他們農業經營的顯著特徵。他們在經營方面的思慮與計畫都遠超過朝鮮人，對於蔬菜的供求關係有精密的研究。比方說，他們預估冬季蔬菜價格會上漲，就把白菜、蘿蔔、牛蒡、大蔥和芋頭貯藏在耕地一角的坑裡，等到明年正月才拿到市場販賣。

肥料與農具

從肥料和農具方面也可以看到支那人菜農的經營是如何的集約。肥料的種類有人糞、豬糞和堆肥。堆肥是把夏天收穫後的殘餘物堆積起來，等待秋天一次和春天溶冰時翻起來使用。養豬是他們農業經營上的重要家畜，其飼養目的之一是豬隻所提供的肥料。人糞的利用在朝鮮人的農業上並不普遍，支那人熟知人與土地之間的物質循環的道理而善加利用。仁川附近，支那人或付錢或免費的收集府內人家的糞便，他們自己又經常在兜售蔬菜的同時向人家約定收集糞便，因此他們的耕地附近都有大型的糞肥池。他們到人家家裡做客吃飯時，順便奉送一些肥料才回家，絲毫不會覺得失禮。他們的農具非常簡陋，種類也少。不過，他們耕種用的鋤頭形狀比朝鮮人的要大，而且來得堅固，因為是用於深耕。他們的一部分農具是移居之際從故鄉帶來的，仁川附近也可以看到支那人自製農具的情形。

勞動與金融

他們對耕地所表現的工作精力是遠遠超過內地人和朝鮮人所能想像的。全家日出即起，一直在戶外從事田間作業到日落。他們又在情況允許之下把不堪勞動的老人和小孩留在家鄉，除了無法離開父母的幼兒，移居者都是能夠從事勞動的人，因此他們的勞動效率是非常高的。如果能夠得到他們的勞動時間和勞動狀態的精確資料，將對農業勞動研究大有幫助。勞動力缺乏時，他們會僱

用臨時的勞工，因此他們本身既是勞動者，也是傭工的指揮者。在這方面他們與朝鮮的內地人農業經營者有霄壤之別：內地人自己不從事勞動，只是僱用勞工，因此他們的農產品價格難免高昂。支那人農民的勤奮程度也反映在他們的金融狀態上。從受雇的勞動者變成獨立農業經營者的人，都是以自己的積蓄為資本；從一開始就是獨力從事農業的人則是把從故鄉帶來的錢作為買種子用，肥料是免費或以廉價取得，其中一些人向租借耕地時的保證人或支那人地主短期貸款，也有人是以交換生產品為約向支那人雜貨商賒貸。他們的地租少則每坪六錢，多則每坪十錢。地租慣例以現金繳納，開始先付一半，收穫後再付一半。因此，他們移居朝鮮當佃農的先決條件是要具備種子費用，一部分的地租和其他少量的準備資金。如此，雖然他們努力經營這種小資本、小規模的農業，無論從蔬菜栽培的本質或是從周圍的情況來看，因為他們不可能從事廣大土地經營，就農業改良來說，在對土地所投入的資本，即肥料、農具以及其他方面的改良，都是今後應行之事。

副業

他們在種菜以外以養豬為主要副業，就是佃農也必定飼養。養豬使農人的零細時間得到利用，又提供肥料，也使資本得到循環。他們所飼養的 Yorkshire 和 Berkshire 種雖然比在來種難以飼養，但是他們努力為之，反而收益不少。部分農家也有養雞，不過菜農以雞隻破壞耕地而不普遍飼養。他們也在住家周圍栽種雞冠花和大波斯菊等花卉，一方面滿足個人興趣，一方面可以當鮮花出售，這個現象在朝鮮人之間是沒有的。

販賣與市場經營

他們對農產品的販賣和栽種同樣熱心，內地人和朝鮮人的同業者在販賣同樣的東西時必須忍痛割價，不然有被他們壟斷利益之虞。例如仁川府所需的蔬菜有七成是由支那人供給，其中大部分經由他們共同經營的市場銷售。這市場內分為一百二十八區，相當於近郊菜農（他們的會員）的人數，每一區的使用

費是一元二十錢，包括水電和雜費，一切都是自治經營。市場的營業額從五月到十月為顛峰，每天平均兩百元左右。

菜農一年的收入

他們的年收入因經營面積和作物種類不同而有差異。根據住在京畿道富川郡多朱面的王清亮表示，他一家六口和兩個長工，耕作面積一町三反步的土地，長工工資一百六十元（每人每月八元，以十個月計算），地租兩百三十元，加上農業生產費和生活費等一切開銷，三年下來可以儲蓄兩百元，以後的兩年更可以儲蓄兩百五十元。很遺憾的，本人並沒有足以跟內地人和朝鮮人農民生活比較的支那人生活的詳細統計，不過上述的具體事實已經足以成為我們的資料。本人以仁川府近郊的菜農為模範地區加以調查，發現這裡只有少數的朝鮮人菜農，而且他們的經營手法幼稚，根本不能和支那人相提並論。就連以前專門栽種蔬菜供應內地人消費的內地人菜農，也因為支那人菜農的出現而不得不中止他們的事業。仁川府附近一戶內地人農民已經維持了八年，另外一戶維持了十年，但是現在都面臨被迫轉業的地步。同樣的例子在仁川府以外的地方也時有所聞。支那人菜農孜孜不倦的小規模經營和集約式的耕作，他們的勤勞與從商和從事勞動的支那人的優越性是一致的。本人在仁川府郊外看到他們為子女建造一小間住宅模樣的校舍，並且請來一名年輕支那人教師負責子女的教育，感到他們的特色都表現在自治設施上。

四、勞動者

支那人勞動者與苦力的意義

提起支那人勞動者大家都會聯想到“苦力”。不過苦力並非這些勞動者的自稱，也不是所有勞動者的總稱。苦力一詞出自印度語的“kuli”，意思是按日算錢的工人。英國人稱之為“coolie”，並以之轉稱支那人勞動者。苦力便是從英文音譯過來的。可是支那人不喜歡苦力一詞，一般稱勞動者為做工作者、力作

者（以上是文雅的稱呼）、做工的、力作的、賣力的、賣力氣的（以上爲俗語）、工人、小工、苦人（以上是雅俗共通的）。其中以力作者、力作的、賣力的、賣力氣的、小工、苦人等專指非熟練工人，也就是與苦力有著同樣的意義¹⁹。

由於支那人勞動者分佈世界各地，對於他們的研究也具有世界性。例如美國在 1909 年已經有 Coolidge 著的《Chinese Immigration》。英國則有 Campbell 著的《Chinese Coolie Emigration》。兩書皆是從本國立場討論支那人勞動者的得失問題。我國有 1909 年小山清次郎的《支那勞動者研究》。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也積極的進行這樣的研究。北京大學的陳啓修對於這個問題也有研究（據前引《新支那》報紙所載）。他的研究顯示支那人口三億五千萬中，有農業勞動者七千萬，手工勞動者七百萬，機械勞動者一百萬，苦力勞動者兩千八百萬，一共有勞動人口一億六百萬。同時又把這些勞動者分爲四類，即奴隸勞動者，自由勞動者（包括農業勞動者和手工業勞動者，而且前者又包含自耕農、佃農和苦力），機械工業勞動者和苦力勞動者（分爲苦力頭和一般苦力）。不過，小山把他們分作兩類，即熟練勞工和非熟練勞工：前者包括從事農業勞動的自耕農、佃農和從事手工業、家庭工業和機械工業的手工業勞動者；後者包括從事農業、工業、礦業、都會業²⁰和水上交通業的苦力。

高級勞動者和低級勞動者在朝鮮的地理分佈

今日朝鮮的支那人勞動者一共有一萬五千八百人，商人（包括交通業者）也差不多有同樣數目。勞動者的分類原來應該依照技術的熟練程度而分作熟練和非熟練工人兩種，在朝鮮的支那人勞動者也應該如此分類。不過，要嚴密的分類是十分困難，大體來說熟練工人屬於高級勞動者而非熟練工人則屬於低級勞動者。從地理上看（勞動者各道分佈一覽表（從略）），平安北道和京畿道最多，咸鏡北、咸鏡南、黃海、平安四道次之，以上六道占總數的九成。而且，六道中除京畿道以外，其餘五道都屬於北朝鮮，共占總人數的七成。由於支那

¹⁹ 小山《支那勞動者研究》。

²⁰ 譯註：具體意義不明。

人勞動者分佈在北朝鮮最多，北朝鮮的勞動者必須面對這些有年輕活力的競爭者。此外，京畿道各種勞動者的比率顯示，高級勞動者遠超過低級勞動者的數目，而且因為這些勞動者大多數從事理髮和與建築業有關的木工、泥水工、石工、砌磚、造磚，他們在京城和仁川等大都市是內地人和朝鮮人的勁敵。在北朝鮮的五道之中，大都市平壤所在的平安南道的支那人勞動者職業比率跟京畿道類似。咸鏡南北道、平安北道和黃海道四道與此相反，都是以低級勞動者居多數，高級勞動者居少數，在職業種類上以土木工人²¹為著。綜合各道的數字，低級勞動者中土木工人和搬運工人佔八成，高級勞動者中木工、泥水工、石工、砌磚工人、製磚工人和鋪屋頂的工人約佔三成。如此，從數量上看，我們得知支那人勞動者在朝鮮的分佈具有地理上的特異性。

勞動者的團結和幫派

我們對支那人勞動者的考察必須從數量方面再進一步檢討他們實質上優越的理由。就低級勞動者來講，他們不僅具有支那人共通的勤奮性，他們之間也具有商人那樣的自治組織，稱為苦力幫。這種組織主要根據同業和同鄉關係組成。在朝鮮，以同鄉關係為主的苦力幫有逐漸增加的趨勢，這是因為同鄉的親密有助於達成結幫的目的。尤其是在語言和風俗不同的朝鮮，對於沒有受過教育的勞動者來說，幫派給他們提供很多的照顧。在一個頭目即苦力頭之下，有十多人以至數十人形成一個有秩序的勞動組織。新義州據說有苦力頭五十人左右，如果我們以每幫有二十名苦力來計算，新義州便有一千人的苦力。本人在新義州見過當地最有名的苦力頭。他因為能夠統率和愛護部下，連對岸安東縣的苦力也有不少人來投靠他。一個苦力在加入某一幫後，除了要服從苦力頭的命令以外，還要遵守嚴格的幫規。苦力對苦力頭的做法若有不滿，可以離開參加另外一幫。可是，只要他是屬於甲幫，就不能同時參加乙幫的工作。苦力們為了避免逐項分擔幫裡費用的麻煩，慣例都是把工錢的一部分交給苦力頭，讓

²¹ 譯註：原文是“土方”，指專門擔任搬運泥土等粗重的非技術性工作的建築工人。

他用來充當幫中各項支出，同時也支持苦力頭的生計。苦力頭代表他的幫跟企業家或企業集團締結契約，而且每幫都有它自己的地盤²²。幫所提供的團體訓練促使它的每個成員的勤奮程度提高，使他們比內地人和朝鮮人勞動者來得優越。現在新義州的朝鮮人勞動者組織的領導人如此說：“朝鮮人勞動者比不上支那人勞動者的原因雖然與個人素質有關，主要還是因為缺乏團體性的訓練”。

對待苦力的態度

苦力對苦力頭的領導有不滿的時候，之所以能夠隨時加入其他幫派，原因在於他們並非熟練勞工，而是完全靠勞力——所謂賣力氣——的體力勞動者。因此，他們的思想非常單純。根據高橋的“支那苦力的思想”（滿鐵讀書會《讀書會會誌》），苦力以出力為苦，懼怕水火之災和死亡，以生命、金錢和食物為重。不過，他們之中或許有部分在歐戰以後曾經以勞動者身份去過歐洲，我們對這些人的態度必須極度謹慎。關於這個問題，永尾在《外國行苦力的今昔》如此說：“本人曾經目睹苦力乘船的情況。從英國駐濟南領事和招募指揮官的上校起，以至各級官員通通出動，他們並不穿著嚴肅的制服，而是穿著西裝親自與苦力接觸，熱心的為他們搬運行李，照顧他們搭船。這些英國人做事方法之徹底實在叫人驚奇。本人受命調查支那人勞動者，稍有旅行的經驗，經常目睹滿鐵沿線的高級官員，處處擺出一付對支那人勞動者的事情不屑一顧的態度。假如這些勞動者是從歐洲回來後轉往滿州工作的話，而他們接觸到的內地人的態度還是以前那種毫無自覺的樣子，那麼他們的反日思想和親歐情緒就會很迅速的發展開來。”

本人引用永尾的話來警告朝鮮的內地人。對於朝鮮的支那人苦力，我們的官員和人民究竟有多認真的去注意他們的生活情況呢？在取締他們以前，有必要先把他們當作人來了解。

²² 小山《支那勞動者研究》。

苦力幫和手工幫

正如低級勞工有苦力幫，屬於高級勞動者的手工業工人之間，也有根據同業關係而組織的手工幫。苦力幫帶有近代勞工組織的性質，手工幫則擁有類似歐洲十二到十八世紀的職業集團（guild）的組織。在前者，苦力頭擁有決定工錢和其他勞動條件的權力，後者的師傅在這方面卻沒有任何權力。由於朝鮮是移居地，當地的支那苦力不一定屬於苦力頭的管轄，也有屬於內地人的勞動者，即承包業者如木匠、石匠等工人頭目。他們有些也在僱主處投宿。從事手工業的勞動者和苦力一樣，並不一定屬於手工幫，為內地人打工的人也不少。不過，雖然不屬於任何幫派，他們的特色是只要開始工作，就算是沒有人監督，也會按照規定的時間好好勞動。京城附近的支那人石工近年有顯著的增加，就證明了這一點。

勞動時間、薪金和效率

他們的勞動時間長短不一，但都能夠從事激烈的勞動和具有長時間勞動的耐力，有些人甚至可以連續勞動十到十五個小時。因此，由於過度勞動而危害身體健康的例子並不少。“山東苦力的勞動狀態”一文（高森著，《青島新報》，1922）提供這樣的資料：

1. 小農和佃農：一般從日出勞動到日落，午餐時間三十分鐘至一小時。夏天下午午睡數小時。勞動時間十三到十五小時。
2. 家庭工業者：他們由於企圖增加總收入而盡量勞動，結果是一直工作到體力的極限為止。勞動時間十四到十七小時。
3. 官營鐵路的苦力：勞動時間因季節而有長短，一般是八到十二小時。

本人曾比較新義州的支那人與朝鮮人人力車夫的工作情形。支那人車夫不但敏捷，端午、中秋等節日也不休假，反而為了掙取額外的收入而在假日勤奮工作。他們的工錢比內地人便宜的多，比朝鮮人則有貴也有便宜。

工錢的高低固然是僱用的重要條件之一，但更加重要的考慮是工作效率。在短時期，支那人和朝鮮人之間的優劣不容易判斷，但是朝鮮人容易疲倦，而

且因為訓練不足，需要中途休息，不能長期持續工作。總的來說，他們的效率比支那人要低。這就是支那人勞動者在朝鮮的勢力日益增長的原因。他們對一般的朝鮮勞動者，以及內地人的一些手工業者，都構成一大威脅。

總督府的政策

總督府對支那人的政策是經過相當考慮的，明治四十三年（1910）八月的統監府令《關於未享有依條約自由居住的外國人》中有這樣的一節：“未享有依條約自由居住的外國人欲從事勞動者，若非特經地方長官之許可，不得在從前之居留地以外的地方居留和從事任何業務。”關於居留地的定義，總督府在大正五年（1916）有以下的表示：

- 1.仁川、群山、木浦、馬山、城津及鎮南浦之各國居留地；
- 2.仁川、釜山及元山之舊支那人居留地；
- 3.舊漢城府五署內地區、舊平壤外城內地區、舊城津土地規則第二條的地域、以及現在之新義州府。

以上的政策是完全針對支那人的；所謂外國人勞動者是指從事農、漁、礦、土木、建築、製造、搬運、拉車、碼頭搬運等雜役的支那人，後來又加上從事補鞋和補鍋的支那人。基於此項方針，各道致力調查支那人的往來情況。試以平安南道廳和鎮南浦近郊為例說明（大正十一年（1922）七月調查）：

	不需許可地區	需許可地區
勞動者	960	372
非勞動者	679	189

不需要許可地區的支那人的職業種類中，勞動者種類較少，有農業、製造、土木、建築、搬運和雜役等。其中雜役三百六十三人，農業三百三十八人，製造業兩百三十三人，三者人數大致相同，三者之總和佔勞動者總人數的九成七。反之，非勞動職業有十五種之多，佔一百人以上的只有飲食店、雜貨店和餐館

(料理店)。很遺憾的，本人沒有朝鮮支那人勞動者逐年增長率的數字。不過，總督府以上的政策可以作為他們人數激增的反證。假如沒有這種限制，朝鮮的支那人勞動者人數要比現在的多幾倍。

支那人勞動者的將來

那麼，上述的政策真能阻擋支那人勞動者移居朝鮮嗎？本人認為有三大困難。

1. 苦力供給地在地理上接近朝鮮；
2. 隨著朝鮮的產業發達和都市化，它對勞動力的需求必然增加；
3. 朝鮮人勞動者效率低下，而內地人勞動者生活水準較高，所以兩者都難以跟支那人競爭。

在記述支那人勞動者之餘，值得一提他們家鄉與朝鮮在地理上的接近和說明他們移居朝鮮的路徑。

支那大量勞動者移居海外的地區，在北方有山東和直隸兩省，在南方有福建和廣東兩省。山東和直隸的過剩人口自明朝開始開發滿洲，尤其是山東省每年都有所謂的山東苦力移出，總移民人口到達三十至三十五萬之間，其中從事農業和雜役的據稱有二十萬之多。這些苦力大部分前往滿洲和內蒙古，每年進入朝鮮的勞動者也屬於他們的一部分。他們或從陸路經過滿洲到安東，然後抵達新義州，或經海路直達仁川上岸。這些人多數在家鄉蓄有相當的恆產，可是一旦離家工作，他們依靠幫會的組織，過著非常勤奮和樸素的生活。《山東的苦力》（青島軍政署山東研究資料）一書說的中肯：“壯年人離家到遠方去當苦力，留在家裡的老幼家人則攀登險峻的山坡搬運肥料，或是從事耕作和收割，絲毫都不厭惡勞動，這都是他們努力堅持的結果……苦力在旅途上忍耐雨雪之苦，冒風霜之艱，衣衫襤縷也不在意。他們背著一個粗布袋，裡面裝著自己做的饅頭當主食，足夠十幾天食用。吃飯的時候就在路邊的井旁坐下休息，邊喝開水邊吃饅頭。唯一的佳餚是用一個銅錢買來的大蔥，用大蔥沾麵醬作副食。晚上他們不肯住客棧，若無其事的橫臥在人家的屋簷下。而他們一旦從事勞動，

決不怕吃苦，也不會抱怨半句”。

我們朝鮮的附近有著這樣勤勞的勞動者供應地。隨著朝鮮的產業發達和都市發展，它對高效率勞工的需求也會日益提高。如此，朝鮮將來必定發生支那人勞動者的問題。

五、生活標準

低生活標準

支那人無論是商人、菜農或是勞動者，他們之所以能夠一步一步的建立基礎，主要是因為幾個複合的條件：強健的體力、勤勞的優良習性和自治的幫會制度。不過，如果他們的生活水準太高，他們所出賣的食品、農作物、以及薪資都會變得昂貴，絕對不可能維持今日的經濟優越性。在衣、食、住的生活三大方面，他們為了達到貨殖的目的，可以節食、禁欲和滿足於僅能阻擋風雨的住處，專注於努力工作。

最低限度的生活標準

支那人最低限度的生活標準，在居住方面以苦力的條件為最低；最底層的勞動者可以棲身在山形的小屋裡，屋旁就是做飯的地方。這種住所是臨時性的，隨時因應需要而頻頻移動，這尤其是在鐵路工程時常見的現象。本人從新義州坐火車經奉天到北滿的途中，就到處看到這種現象。試以新義州苦力頭轄下的苦力住所為例；那裡每個苦力所擁有的空間只能容他躺下，隨身之物也只有一條棉被而已。如此，他們夏天睡在地板上，冬天則睡在炕上。至於種菜的佃農，他們的住家因為是蓋在需要繳納昂貴地租的土地上，所以面積都是僅足容納家庭成員而已。如此，他們家裡除了吃飯的地方，兩邊不過有八、九平方米的炕。他們故鄉的房子都有土牆環繞，在朝鮮這個現象則幾乎未見。上述的居住環境是他們支那人固有的，商人以及苦力頭的家也不例外。為了採光，所有的窗戶都開在炕邊的牆上。牆上貼著粗糙的彩色支那戲劇或歷史人物的圖像，這個習

慣在朝鮮民家裡是絕對看不到的。家具方面如照片（從略）所示，是極其簡陋的，不過一般家裡都有時鐘，這一點跟朝鮮人不一樣。他們每個人穿的都是藍色的棉布衣，有單層的、雙層的和棉襖，可以隨意的組合穿著。食用方面本人沒有機會觀察到，不過新義州等地的工業勞動者早飯和中餐都是食用高粱粉或是玉米粉做的麵包，晚餐則常食用小米飯。至於仁川附近的佃農，他們以小米摻米或麥為主食。如此，他們的食物好像很粗糙，不過他們常以豆腐、韭菜和大蔥沾麵醬為副食，從而幫助滋養身體。他們的食物究竟包含多少營養價值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

生活費、結婚費、儲蓄

支那人雖然過著簡單的生活，每月卻必定儲蓄。根據高森的報告（“山東苦力的生活狀態”《青島新報》），苦力的生活費和儲蓄的比率如下。

	日薪 30 文		日薪 40 文	
主食	13	43%	21	52.2%
副食	2	9%	3	7.5%
衣服費	2	3.6%	3	7.5%
雜費	11	36%	12	27.5%
儲蓄	2	6%	2	5%

	獨身苦力	有眷（小孩一名）
食物	50%	57%
衣服	2.5%	7.5%
房租	2.5%	7.5%
雜費	35%	22.5%
儲蓄	10%	5%

苦力的配偶主要是透過婚姻買賣制度獲得，即使是低級的苦力，為了結婚也必須支付這種買身費。這是他們努力儲蓄的原因，就是低級苦力為了結婚也至少要準備五十元。以一天存款兩仙計算，要累積到五十元的聘金，必須連續七年無休的工作。新義州的苦力的伙食費每個月差不多要 9 元，住宿費不過六、七元。一天工資八十錢的土木工人，一個月工作二十五天就可以賺到二十元，除掉八元的生活費（伙食費）和三元的雜費，一個月還剩九元，一年勞動十個月就可以得到九十元的儲蓄。

娛樂的種類

同樣的，根據在新義州的調查，支那人的娛樂是到安東去看戲，或在休息時間和晚上拉胡琴唱歌，或是以幾個錢和一點煙酒下注賭博，就是喝酒也不會像朝鮮人那樣喝到酩酊大醉。不過，他們經過整天勤勞工作以後的最大享受要算是大眾浴場。在浴場裡可以理髮，也有喝茶和抽煙的地方。至於他們的高度工作效率是如何通過促使身心一新的娛樂來培養，這應該是研究勤勞無比的支那民族時最需要注意的問題。不過，這是必須以有系統的方法調查和假以相當的時日才能夠取得充分成果的。

結 語

我國的歷史、考古和思想家已經就支那民族對朝鮮的政治、思想和藝術的影響，是怎樣通過朝鮮半島跟我的文化發達發生關係的問題進行了研究。現在支那民族在朝鮮半島作為一股強大的經濟和社會勢力，已經在各方面接觸到我們日本人的生活。這雖然有從多方面去考察的必要，可是我們卻缺乏對於這個問題的完整調查。本人的敘述不過是根據不到一個月的調查，因此只能窺見他們的活動的一面而已。尤其是因為作者本身並非商人、菜農或勞動者，所以本文所提供的不過是一個概觀。本人認為無論是朝鮮或是內地商人、農民和企業家，都有必要從自己的立場主動去考察支那人的問題，除了說明他們經濟上

的優越性，最重要的是進一步了解他們怎樣能夠達到極高效率的身心狀態，尤其是他們的道德狀態和營養狀態。本人的調查僅提供作為基礎。

根據美國俄勒崗州的一項日支兩國移民的勞動和生活程度的比較（見大正二年（1912）波特蘭市日本領事井田在《通商公報》裡的報告），相對日本人每月九美元七十五分的生活費，支那人只需要七元六十五分；此外，日本人的生活費裡百分之八十九用於購買美國貨，相對之下，支那人只用百分之四十購買美國貨，其餘的用在本國產品之上。這就是支那人自主自立的證明，實在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因此，本人深深感受到朝鮮支那人的研究和調查不只是朝鮮本身的問題，作為將來日本內地的問題，也應該早日著手進行。

參考書目

山邊健太郎

1971 日本統治下の朝鮮。東京：岩波書店。

小熊英二

1997 單一民族神話の起源－日本人の自畫像の系譜。東京：新曜社。

淺田喬二

1985 日本知識人の殖民地認識。東京：校倉書房。

朝鮮總督府編

1924 朝鮮の支那人。京城：朝鮮總督府。

飯島涉編

1999 華僑，華人史研究の現在。東京：汲古書院。

華僑志編纂委員會

1958 韓國華僑志。台北：華僑志編纂委員會。

楊堅校點

1981 錢單士厘癸卯旅行記、歸潛記。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福崎久一編

1996 華人、華僑關係文獻目錄。東京：アジア經濟研究所。

警保局外事課

1923 支那人勞動者取締狀況。油印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

籠谷直人

2000 アジア國際通商秩序と近代日本。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

Tanaka, Stefan.

1993 Japan's Orient: Rendering Pasts into History. Berkeley &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Tsu, Yun Hui.

1996 Wartime Japanese Discourse on the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Paper
presented to the Seminar on the Contemporary Agenda of Anthropology,
July 15-20, Graduate School for Advanced Studies, Hayama, Japan.